

## 遵义会议前后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有议论，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可见他也是早有意见的，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因为负过较重的伤 身体很不好 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过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四、五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的印象是在 1 月 12 日左右。1 月 15 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 1 月 8 日，我看很可能是 1 月 18 日之误。因为 1 月 8 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 1 月 9 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

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 也要吃饭 也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 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 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 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 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 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 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 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 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

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了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撤离遵义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本文摘引自《中共党史资料》作者伍修权）

##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 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 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列几个问题。

###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7日晨2时）已袭占遵义”。同日23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9时（按：应为8日9时）移至遵义城”。

1月8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9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9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1月10日5时40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9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1935年1月17日报称：“遵义1月7日失陷”伪遵义县县长徐道伟在呈文中也说：“至（6日）午夜12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一、三、五、八、九军团1月3、4日由瓮安窜遵义，7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

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 1 月 7 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 8 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 9 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 1 月 9 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依据如下：

1 月 13 日 24 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 15 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 14 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 3 天 完成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开幕的 1 月 15 日起 经过 3 天 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 17 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2 月 10 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 9 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 1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1 月 14 日 14 时 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1 月 15 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 1 月 14 日至 17 日 23 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一月 16 日 24 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

首长除林、聂外 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 1 月 17 日 23 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 1 月 8 日通过的 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 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 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就说明 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

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译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

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

###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

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

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 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 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 1977 年 8 月 23 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是我们不能粉

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的，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1943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

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 1935 年 2 月 5 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见附图）。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 1935 年 2 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 1935 年 2 月 5 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核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 1931 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1943 年 11 月 13 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洛甫同志于 1943 年 12 月 16 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

周恩来同志于 1943 年 11 月 27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

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1972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

1938年4月12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 （二）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作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